

究多年,大家都以“好”,“坏”,“成功”等来评价这些工程。其实生态移民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移民现象,这个现象背后有很复杂的社会关系,是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经过博弈,最后达成的一个结果。对于生态移民的主体农牧民来说,他们考虑的是,我到这个移民村合算不合算。他们不会特意考虑什么生态,更不会为了生态而牺牲自己的生活。相关企业所考虑的则是如何利用生态移民这个工程来赚取更多的利润。当地基层政府首先想到的是怎么把上级政府安排的工作做好。这些工程做好做坏关系到他们的

政绩,无论是政治的利益还是经济的利益,他们都要考虑的。更上一级政府可能考虑怎么样设计这个工程,达到经济和生态的双赢。到中央政府这个层次,他们的目标则是纯粹的生态治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农牧民,作为不同的利益群体都想从生态移民工程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而采取各自不同的行动策略。发现和解释这些由不同的利益和行动主体构成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过程,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特点,且只有受过社会学训练的人才能做的工作。

## 环境保护与环境抗争

——张玉林教授访谈录<sup>①</sup>

**【人物简介】** 张玉林教授,男,1985年7月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新华日报社从事新闻工作。1992年12月赴日本京都大学留学,主攻农村社会学,2000年3月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曾在南京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做博士后研究,并执教于该校社会学系。2002年9月调入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4年11月起任教授。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的农村与农民问题,关注领域为社会问题和社会生态。

中图分类号:C91;X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1)02-0023-03

沈淑珍(简称沈):从您的作品中,我们看到您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社会及教育平等上。大学毕业后,您也做过一段时间的记者工作。您从事记者以及农村社会学研究的经历,对您从事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张老师(简称张):应该是有影响的,我从1985年开始在新华日报担任记者,先到苏北的连云港,在乡里做了一年,然后在县里做了一年,这样我从中观这个层次上加深了对基层社会的了解。两年后回宁,虽然从事多方面的报道,但主要还是关注农村社会、农民问题。受20世纪80年代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影响较大,当时我想做一个作家,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影响社会。后来因为发生了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记者工作受到了影响,我就到日本攻读农业哲学、农村社会学。在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习中,我从国家与农民关系、城乡关系的角度去研究农村社会。在研究过程中,力图从结构、状况加以梳理和概括。

我的硕士论文是关于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建立原因的探讨。户籍制度是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的核心制度。在当代中国它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这些问题当

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我在硕士阶段研究了这些方面,考察了农业集体化时代的国家与农民关系,50年代的农民流动引起的问题及其与户籍制度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1978年以后也即转型期的国家与农民关系。

在做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我发现教育、环境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与农民关系、城乡关系中非常重要的因素,有些既是原因同时又是结果。当然这里面有制度方面的、文化方面的,包括工业化、城市化方面的问题。我关注的领域比较广,不过在做博士论文时主要关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在博士论文提交之后,2000年我回到国内。回来后我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研究农村教育问题,不是从教育学的角度,而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做研究。主要研究教育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是如何影响农村社会与农民生活的?

后来我的研究转到了环境方面。农村教育虽然问题很多,但我觉得我关注的问题已经说清楚了。而教育问题要真正解决,说实在话非常困难。而农村环境这一块,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我认为在未来的数十年里,它肯定是农村、农民乃至农业问题的核心。这样从2004开始,我将研究重点转

收稿日期:2011-04-21

受访者简介:张玉林(1965—),男,江苏徐州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从事社会问题和社会生态研究。

① 本访谈由河海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系研究生沈淑珍进行访谈及整理,张玉林教授对访谈内容进行了审核。

到了农村环境领域。

日本、美国,特别是日本,研究环境社会学的学者中很多也是研究农村社会学的。这一点与农村社会学的学科特点有关。因为它关注的是农村、农业、农民,而三农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远比城市、城市居民以及工业和环境的关系密切。一旦环境变迁或恶化都将造成不良后果或损失,农民比较容易感受到。一个敏感的农村社会学学者可能更容易意识到这个问题,而研究城市社会的学者可能很少能意识到。

另外,我的研究转到环境问题也可能与我的生活经历有关。我出生在农村,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包容在青山绿水之中。当时可能没有很明确的认识,后来发现这些东西很重要,但是慢慢地失去了。我做农村调查时到过很多地方,发现在短短的10年、20年间,农村的生态、自然环境确实变化很大,恶化很快。而经济学、法学等学科的学者一般不到现场,虽然他们也能从新闻报道或身边的环境了解到河水很脏、空气很糟糕,但不会想到环境污染对包容在自然环境中的农民和农村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

沈:我仔细拜读过您的文章《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与中国农村的环境冲突》,文中提到选择“自力型救济”的受害农民在缺少理性组织引导的情况下,容易产生极端情绪导致暴力事件。我们也调查到很多的环境抗争都是自发的。您认为目前中国环境抗争缺少理性组织指导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张:缺少理性组织的引导实际上涉及一个更宏观、更深层的问题。因为直到现在,“国家”还是警惕“社会”的。在权力和权利的关系上,权力还是惧怕、抑制着权利。这可能与执政党的观念、权力产生的来源有关系。国家对社会、民间的组织化比较担心。

实际上它(国家、政府)没有认识到社会的组织化,包括底层民众的组织化,虽然有可能会对政府产生一定的压力,但同时它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在相对稳定时期,分散的个人虽然对政府造成的压力比较小,换句话说,政府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在关键的时候,它很容易演化为“暴民政治”。就像一旦发生围攻、围堵时,分散的个体很容易聚集成“乌合之众”,如果有一个合法的组织,就会负起责任,会考虑抗议的合法形式,尽量用比较低的成本,去获得长期的比较现实的收获。而没有一个核心的组织,相关的行动就没有灵魂,没有周密的考虑。洪大用教授曾讲过,一旦有风吹草动、有契机,(环境群体性事件)就会情绪性地爆发。环境运动很重要,但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某种程度上不是环境运动,而是环境骚动或暴动。这种暴动是转瞬即逝的。政府会

把它压制下去,甚至不用压制,受害群体砸完了、烧完了,事件也就结束了。它不会有长期的、制度性的建设。

沈: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似乎是一对矛盾。我们今年到苏北的一些农村做调查时,发现很多地方正在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致力于以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一些人期待这是解决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矛盾的一个出路。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我觉得这实际上还是从技术层面来理解的,“生态农业”主要是从技术层面考虑的。当然技术和文明是分不开的,技术是承载文明的一种手段,也是人们适应社会变迁的一种手段。但技术只是工具,是否能够实现某种目的,则存有疑问。生态农业、观光农业主要成了一种装饰。因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最根本的问题是食物的来源。单纯搞观光农业是不可能解决这个大问题的。在微观上有它的作用,但就整个中国粮食自给率达到95%这个目标而言,是不现实的。如果把10%的土地用来搞观光农业,那国家的粮食安全是要受到影响的。我们考虑问题既要从微观层面来考虑,也要从宏观层面来考虑。至于生态农业,有很多地方搞了生态农业示范区,但到现在为止没有一家是真正的生态农业。因为生态农业要有相应的条件,如果降水酸性比较大,空气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污染已经相当严重,那么仅仅是减少点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还不是生态农业。当然,大量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也是非常关键的。但如果大的生态环境没有根本好转,生态农业是无法实现的,它只能是一个奋斗的目标。近年来,中国环境恶化的速度有所减缓,但继续恶化的趋势并没有改变。国家公布的相关数据看起来有所好转,但实际上并非尽然,因为衡量环境质量指标标准变了。比如,2002以后的Ⅲ类水和以前的Ⅱ类水并不是一个概念。可能有一些复杂的因素在起作用,甚至包括行政方面的策略因素。

沈:我听过您的讲座,您和您的学生在研究环境问题时,也调查过癌症村,您觉得环境污染和疾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张:我们现在只能做个大致的判断,两者之间肯定是有关系的。联合国出版了比较权威的文献,很多学者也在反复引用。人类80%的疾病是与饮水有关的。如果水遭到污染,那么肯定会导致一些不良后果。但我们不是搞医学、化学研究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者的判断只能停留在这个程度上。所以要把疾病原因具体地量化,某种疾病在多大程度上由环境污染引起的,多大程度上是由不良生活习惯

所导致的,我们无法确定,需要相关的专业研究人员去做大量细致的研究。

我走过十几个疾病高发村庄,我对媒体上的一些报道也是持怀疑态度的。对于疾病以及它与污染的因果关系,记者也是外行,也无法确定。另外,许多报道相对来说是比较浮躁的。一个人报道之后,其他人跟着报道,但许多人可能都没去过那个地方。有些是道听途说,有些调查采访不够深入。但基本事实确实是很清楚的:疾病确实是高发的。要具体详细地做归因分析,不是记者,也不是我们能够做到的,而是有赖于医学研究者、化学和环境学的研究者。但这些研究实际上受到限制,这也是与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有关系的。刚才讲国家害怕社会,这样的状况实际上限制了相关的研究。比如日本,四大公害发生之后,有大量的医生和医学研究人员去作相关的因果关系的研究。而我国学者基本上没有这样做,也很难这样做,因为这样做要冒风险。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沈:从您对社会科学领域内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总结中,我们了解到社会学领域对环境问题的研究相对于其他学科还远远不够,社会学者真的是任重而道远。您今后在环境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侧重点将会是什么?

张:我研究的实际上不是环境社会学,而是环境问题,环境问题与社会,主要是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虽然我有社会学的视角,但仅仅有社会学的视角是不够的。因为环境、生态本身是复杂的系统,再加上经济、社会、文化、政治这些因素,就更复杂了。我认为,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现在需要学科的整合。一方面,各个学科要走到一起、进行合作;另一方面,就单一的学科来讲,必须充分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比如疾病高发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实际上已经有少数这方面的研究了。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在同一个区域,尽管有同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但距离河边(污水河)远近不一样的村庄,其疾病发生率是不一样的,靠河边的村庄疾病发生率高,据此可以推断是环境污染造成的。将类似的医学研究成果吸收进来,将各个学科的研究整合起来,我们的研究就会更客观、深入一些。

我把自己的环境问题研究主要定位在历史学的或者说是社会史、环境史的研究。目前主要从事一项有关华北生态环境在当代变迁状况的研究。我感到,只有从长期的历史变迁的角度来考察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问题,才能更为有效地看到问题的本质和复杂性,看到它与社会、政治、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目前的问题在于,许多学科缺少历史的眼

光和纬度。学经济的不学经济史,学社会学的不学社会史,研究环境的不了解环境史。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环境研究主要靠一些理论、概念,对于问题本身的全貌和演变状况等缺少足够的关注,结果其研究成果就是既扁又平的。我自己的研究取向是要去“建构”,要把问题本身完整地呈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我会力图摆脱社会学单一学科的范围,充分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

沈:您曾认为“底层民众的挣扎和基层社会的动荡通常被看做‘形而下’的问题而很难成为研究对象”,即使进入学术视野也难被看成社会历史事件而得到重视。经过这两年的发展,您现在对这一问题有没有什么新的看法?

张:这只是一种大致的结论,或者说基本的判断。严格说来,底层民众的受害状况并不是没有丝毫的反映。实际上,国内的新闻媒体从90年代中期开始就有一些报道。但是如果看学术界的主流,比如说各个学科最有影响的一批学者,几乎没有人研究这类问题;那些被当作一级期刊、权威期刊的学术刊物,则极少刊载这类内容的研究。在政府层面上也是一样。对于环境受害者、生态破坏受害者的(虽然也下跪了,也感动他了)问题并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调查。也没有行政机构想到要建立起一套相应的社会救助机制。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涉及污染方或负有责任的政府愿不愿意付出补偿、赔偿的代价。如果愿意付出代价、必须付出代价的话,就感到痛了,其随后的污染和破坏行为就要收敛了,也要受到限制了。现在(污染方)不需要赔偿,不需要付出代价,所做的无非就是搬迁,比如说从宜兴搬到阜宁。

还有一个问题,由于媒体很发达,我说的是数量上的和传播技术上的发达,每个社会成员、每一个研究者都处在信息的“洪水”中,都被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包围着。但中国的问题太多了,每一个问题好像都是核心问题。我原来研究教育问题,觉得很关键很重要,研究腐败的问题是这样,现在环境问题也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环境问题很容易被其他问题掩盖或遮蔽掉,或者说问题的严峻性、突出性会被淡化、被淹没。这时候需要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使环境问题始终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这样才能形成持久的压力,迫使政府、企业以及每一个社会成员去行动,这是非常关键的。

沈:您也研究环境冲突,您觉得在中国目前的环境抗争中老百姓总是不能获胜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张:总是不能取得胜利、总是失败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包括美国、日本,从他们各自国家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环境受害者的抗争也不总是能获胜

的,实际上也经常是失败的。但在中国有个特殊情况:二次受害。(老百姓)受害了,不反映、不挣扎、迁走、一走了之,可能还好一点,可能事情就了了。如果采取行动起来抗争,上访、告状、静坐,那么基本上就会遭到二次受害。二次受害就是受到镇压、打击,包括黑恶势力出面施害。在发生污染纠纷的地方,很多情况下政府明显是站在污染企业一边的,一方面维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维护污染企业的利益。这种情况在日本、美国很少见。如果事实关系已经

明确,污染方确实有排污行为,确实违背了环境法、排放的污染物确实超标了、老百姓也确实受害了,那么日本、美国的公共权力一般是不可能、不敢公开地站在污染企业一边的。不会像我国有些地方的领导人那样,老百姓上访就把他抓起来,或者说他是“精神病”。当然在非洲、南美的一些国家,也有起来抗争的受害者被某种势力镇压下去的情况。这是一个制度性、结构性的问题。

## 农村环境问题的若干思考

——王晓毅研究员访谈录<sup>①</sup>

**【人物简介】** 王晓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1987年从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研究领域涉及农村发展与农村环境、农村贫困、农村社会冲突等方面,曾发表论文《村庄内外》(合著),《农村工业化与民间金融》(合著),《环境压力下的草原社区》等,主编了《斯科特与中国乡村:研究与对话》、《中国12村贫困研究》,翻译著作有《国家的视角》等。

中图分类号:C91;X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1)02-0026-03

徐寅(简称徐):您以前一直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而且环境社会学在美国的发展趋势就是从农村社会学家转变为环境社会学家,请问您以前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经验对于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有什么影响吗?

王晓毅(简称王):我做研究已经20多年了,前10年的研究地点主要在东部,后10年我在西部跑得多一点。那个时候在西部,很大程度上就是关注西部的发展和贫困的问题。可能在西部跑的时间长了,看得也多了,我感觉西部贫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和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现在都不知道我不是在从事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应该说不是在做环境社会学研究,只是在做农村环境问题研究。在我研究的“工具箱”里面,什么工具都有,既有社会学,也有文化人类学,还有经济学等。所以我到现在为止也不算是真正意义上做环境社会学研究的。

我关注环境问题是关注整个农村发展问题开始的,原来的所有的经验都和我现在的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比如,我在描述北方干旱地区草原环境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当地农民的博弈,也就是我所称的“猫鼠游戏”,政府不断去强化管理而

农民则想尽办法躲避。这样一种分析范式,实际上就是从农民社会分析范式转过来的。农民研究的理论方法对于研究农村环境问题还是很有帮助的。

徐:您曾提到,草场退化与其说是“公地的悲剧”,不如说是“没有管理的公地的悲剧”,当集体和集体利益被弱化,往往会导致国家政策成为农民的外在强加物。那么您认为国家政策对农牧民的作用是怎样的?

王:首先讲《公地的悲剧》,哈丁自己也在反思这篇文章,20世纪80年代哈丁又写了一篇文章对公地悲剧的理论做了修正,公地的悲剧不是一般意义上公地的悲剧,而是没有管理的公地的悲剧。现在我们整个社会,尤其是环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管理。我说的没有管理不是说没有制度、政策和机构,这些都有,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些根本没有发挥作用。为什么没有发挥作用呢?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把国家和农民中间一个层抽空了,变成了国家直接对应农民。中间这层我们把它叫做社区也好,公民社会也好,甚至是传统规范和伦理也好,这块在改革开放以后已经被大大弱化了。

由于缺少这块的支撑,因此在政策落实的过程

收稿日期:2011-04-21

受访者简介:王晓毅(1961—),男,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

① 本访谈由河海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徐寅进行访谈及整理,王晓毅研究员对访谈内容进行了审核。